

全唐五代笔记

第一册

陶敏 主编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全國高等學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課題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規劃重點項目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全唐五代筆記

第一冊

主編 陶敏
副主編 李德輝

參編人員（以姓氏筆劃爲序）

李一飛 李春桃 李德輝 何湘

周靜 陳中群 陳衛才 陶紅雨

陶敏 雷磊 魯茜 劉辰

齋藤茂（日本） 羅爭鳴

陝西出版傳媒集團

三秦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全唐五代筆記 / 陶敏主編. —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8.05

ISBN 978-7-80736-246-3

I. ①全… II. ①陶… III. ①古籍-中國-唐代-選集
②古籍-中國-五代(907~960)-選集 IV. ①Z42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096073 號

全唐五代筆記

主 編 陶 敏

出版發行 陝西出版傳媒集團 三秦出版社

陝西新華發行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號

電 話 (029)87205121

郵政編碼 710003

印 刷 中煤地西安地圖制印有限公司

開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張 221.25

字 數 3638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數 1-1000

標準書號 ISBN 978-7-80736-246-3

定 價 980.00 圓

前言

有唐一代孕育和創造了輝煌的歷史和燦爛的文明，爲後人留下了豐厚的文化遺產。全唐五代筆記就是這宗寶貴遺產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

作爲一種文體，筆記最早是與辭賦等韻文相對而言的。古代稱散文爲「筆」，與辭賦等韻文相對時就稱爲「筆記」。劉勰《文心雕龍·總術》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才略》中又稱路粹、楊修「頗懷筆記之工」。《藝文類聚》卷四九梁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傳》稱讚任昉「辭賦極其清深，筆記尤盡典實」，也是將二者對舉，把筆記視爲一種記事性的散文文體。隨着時間的推移，「筆記」逐漸被視爲一種著述的體式，即指由一條條相對獨立的記錄見聞雜感的札記彙編而成的著作。以「筆記」名書始於北宋宋祁，但作爲著作之一體則源遠流長。廣義說來，記載孔子言行的語錄體的《論語》，也可以稱爲筆記，干寶《搜神記》和劉義慶《世說新語》更被後人稱爲魏晉南北朝時期志怪筆記和軼事筆記的代表作。

筆記作爲一種著述體式，主要是隨筆記錄見聞，發表看法，多是「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漢書·藝文志》）的「殘叢小語」，所以古人給了它一個不無貶義的名稱：「小說」。有別於那些經過精心結撰的主題嚴肅、題材重大、內容集中、體例謹嚴的著作，筆記有着極強的包容性和極大的隨意性，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舉凡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學、奇談怪論、瑣事屑聞、鬼怪傳說、人間百態，都可以納入它的範圍，可謂包羅萬象。筆記的篇章往往具有高度的獨立性，它們之間可以有某種外在或內在的聯繫，但這種聯繫往往是極爲鬆散的，也並非是絕對必需的。筆記作爲著述體式的這些特點，影響到筆記的文體本身。它以作者自身爲主體，往往可以突破傳統文體規範的限制，從思想到行文都十分自由，既可用以抒情敘事，也可用以說明議論，風格亦莊亦諧，文體或駢或散，篇幅可長可短，初無定格。正因爲筆記爲作者提供了極爲廣闊的放言肆論的空間，所以笑話、遊記、傳奇等傳統文體，隨筆、小品、雜文等現代文體往往孕育於其中。隨筆等還可說是散文的分支，與古

代「殘叢小語」的「小說」概念並不抵牾；而唐代在記人和志怪兩類筆記的基礎上形成的傳奇，其本質却近於現代意義的小說，與古「小說」的含義大相逕庭。爲了更好地反映古「小說」發展的實際，宋祁《筆記》三卷正式以「筆記」二字作爲書名，而《京本通俗小說》則堂而皇之地接過了「小說」的旗號。此後，筆記仍然以其靈活多樣、不拘體例篇幅的寫作形式贏得了衆多文人的喜愛，蔚爲大觀，成爲中國古代著述之林中一個不可忽視的群落，而筆記文也成爲古代散文中一種重要的文體。

在筆記史上，唐五代時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發展階段。唐人注重事功，關懷現實，重視物質和精神的享受，很少有人窮年累月閉戶下帷地去從事名山事業。對他們來說，筆記這種著作體式似乎是一種最佳的選擇。所以這一時期，筆記出現了空前的繁榮。唐五代筆記的數量無法作出精確的統計，以《新唐書·藝文志》而言，僅子部「小說家類」已著錄筆記五十餘種，加上史部「雜史類」和「雜傳記類」中《大唐新語》、《國史補》、《傳載》、《史遺》、《朝野僉載》、《封氏聞見記》、《投荒雜錄》、《尚書故實》等，即有近百部之多。其他如經部「樂類」中《教坊記》、《樂府雜錄》、《羯鼓錄》，史部「地理類」的《吳興雜錄》、《嶺表錄異》、《北戶雜錄》，集部「總集類」的《杼情集》（即《杼情集》）、《本事詩》等，都可以視爲筆記著作。《新志》不著錄五代的筆記，而唐人筆記如郎餘令《冥報拾遺》、南巨川《續神異記》（見《西陽雜俎》卷一三）、戴孚《廣異記》、薛漁思《河東記》、孫榮《北里志》、佚名《聞奇錄》、劉山甫《金溪閒談》（見《北夢瑣言》）等，均未見於《新志》，可見《新志》的著錄很不完備，遺佚尚多。大約估計，唐五代筆記總數當在二百部以上。

和唐人的關注現實，重視事功一致，許多唐五代筆記表現出強烈的娛樂性和世俗化的傾向。它們走出了嚴邃的學術殿堂，褪去了宗教的神聖光環，也不限於紀述達官名士的軼事，而是廣泛記錄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其題材和內容遠比前代豐富多彩。李肇在《國史補序》中已經將「助談笑」作爲自己寫作目的之一，韋絢記錄劉禹錫談話的目的是爲了「傳之好事以爲談柄」（《劉公嘉話錄序》）。溫庭筠在《乾牒子序》中自云：「不爵不祿，非庖非炙，能悅諸心，聊甘衆口，庶乎『乾牒』之義。」（《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等於說筆記是他們精神上的美味佳肴。《西陽雜俎》卷八「黥」記錄了有關墨刑和文身的故事二十餘事，末云：

成式以君子耻一物而不知。陶貞白每云：「一事不知，以爲深耻。」況相定黥布當王，淫著紅花欲落，刑之墨屬，布在典冊乎。偶錄所記寄同志，愁者一展眉頭也。

可見娛己樂人已成爲許多筆記寫作的共同目的。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學術性筆記也悄悄產生了變化，它們的內容遠遠超出經籍、典制考據的範圍，關涉到社會生活的各方面。特別是生活中新出現的事物和現象。例如，《蘇氏演義》卷上對「醋大」、「婁羅」等新語詞，「新婦跨馬鞍」等時下禮俗特別關注，《資暇集》對於新出現的「畢羅」、「不托」等食品，「茶託」、「被袋」等用具，「書題」、「門狀」等事物甚感興趣。《資暇集》還偶涉士大夫生活瑣事，其「熊白啗」條云：

貞元初，穆寧爲和州刺史，其子故宛陵尚書及給事已下尚未分官，列侍寧前。時穆氏家法切峻，寧命諸子直饌，稍不如意，則杖之。諸子將至直日，必探求珍異，羅於鼎俎之前，競新其味，計無不爲，然而未嘗免咎叱之過者。一日，給事直饌，鼎前有熊白及鹿脩，忽曰：「白肥而脩瘠，相滋其宜乎。」遂同試，曰：「甚異常品。」即以白裹脩，改之而進，寧果再飽。宛陵與諸季望給事，盛形羨色，曰：「非唯免咎，兼當受賞。」給事頗亦自得。寧飯訖，戒使令曰：「誰直？可與杖俱來。」於是罰如常數。給事將拜杖，遽命前曰：「有此佳味，奚進之晚耶？」於是聞者笑而傳之。

叙事十分生動，含義亦復雋永。《四庫全書總目》批評它「忽雜嘲謔事，於體例尤爲不倫」，這是對唐五代筆記的發展狀況缺乏瞭解的緣故。

趣味化和世俗化的傾向，還表現在筆記作者對於社會現實、普通人物、特別是文人士生活和創作的特別關注。朝廷政事，將相功業，官吏的宦途通蹇，士子的科場進退都是筆記記載的重要內容。李德裕的《文武兩朝獻替記》記載了自己身居相位時獻可替否的事迹。韓偓《金鑾密記》記載了昭宗末年爲翰林承旨學士時的宮廷秘聞。志怪筆記作者搜奇紀異的筆觸更多地轉向了人事，如《卓異記》、《朝廷卓絕事記》、《翰林盛事》等專記家世功名顯赫等卓異的人事，《定命錄》、《前定錄》、《續定命錄》等則記達官士子壽算官職科名前定之事。文士的生活和詩歌的創作更爲筆記所關注。從《朝野僉載》、《隋唐嘉話》到《大唐新語》、《唐摭言》、《玉堂閒話》等許多

筆記中，都有詩歌的記載，《劉賓客嘉話錄》、《樹萱錄》等也有評詩論文之語，《資暇集》、《兼明書》等論及詩文作品的詮釋和注解，而晚唐五代出現的《雲溪友議》、《抒情集》、《本事詩》等更是專門記載詩歌及其有關本事的筆記。宋代詩話以記載詩歌本事和背景、評析和欣賞詩歌、詮釋詩歌的詞語典故為主要內容，正是由筆記派生的支流，而唐五代筆記早已為它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強烈的趣味化、世俗化的傾向，對現實生活的深切關懷，使軼事與志怪兩類筆記相互吸引，形成合流的趨勢，並導致了傳奇這種新興文體的異軍突起。志怪筆記本來就具有情節曲折、想像豐富的特點，在唐代社會風氣的影響下，開始淡化了宣揚因果報應的迷信成分，轉向記述現實生活中男女情愛、宦海沈浮、人生遇合的曲折故事，又運用史傳的筆法，吸收軼事筆記以細節對話刻劃人物的長處，由粗陳梗概的記事發展到具有小說規模的傳奇。與此同時，以紀實為特徵的軼事筆記雖然大多保持着篇幅短小、文筆省淨的特點，但往往獵奇記異，又帶上了傳奇的色彩，也不乏篇幅較大敘事委曲的篇章。筆記本是客觀紀實的著作，即使六朝的志怪筆記，也是以紀實傳信為目的，「因為他們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樣的，統當作事實」（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一些筆記中的篇章如《抒情集》中的「薛宜僚」、《唐闕史》中的「杜牧」、《玉泉子》中的「李福女奴」、《本事詩》中的「崔護」、《三水小牘》中的「却要」，却重在張揚主觀的精神，即有意為小說，和人們艷稱的傳奇名篇《李娃傳》、《霍小玉傳》甚至《柳毅傳》等相較，已經沒有質的區別了。虞集認為：「唐之才子，於經藝道學有見者少，徒知好為文辭，閒暇無所用心，輒想像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傳會以為說。盍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娛玩，非必真有是事，謂之『傳奇』。」（《道園學古錄》卷三八《寫韻軒記》）這種看法是很有見地的。

當然，事物的發展不可能是整齊劃一的。雖然小說與筆記分離是宋代的事情，但是，在唐代有的傳奇已經以單篇的形式流傳，傳奇或被單獨編撰成集（如陳翰《異聞集》、裴鉞《傳奇》），或附錄在筆記之後（如《常侍言旨》後附《劉幽求傳》和《上清傳》），說明唐人已經意識到二者的差異。所以，在唐五代，軼事筆記和志怪筆記儘管有着合流的趨向，它們中的大多數又仍然保持着各自的傳統和特點，沿着自己的方向前進。

唐五代筆記以唐五代人而記錄當時的人事聞見，保存了大量政治歷史、典章制度、人物傳記、文學藝術、思想觀念、宗教民俗等方面的史料，有着很高的史料價值。

唐五代軼事筆記和史學著作有着錯綜複雜的關係。有的筆記如《開成承詔錄》、《文武兩朝獻替記》等，本身即是史學著作。有的直接摘取史學著作編成或和史籍有着共同的史料來源，如《大唐新語》、《談賓錄》等，有的則以「史補」、「史遺」、「闕史」、「遺事」為書名，自承是史的支流。作為當時人的記載，它們提供的史料有的可據以補史籍的闕遺，曾經被正史採用或參考，有的則可據以糾正史籍的錯誤。《舊唐書》卷七七《劉易從傳》云：

……後歷彭州長史、任城男。永昌中，坐為徐敬貞所誣構遇害。易從在官仁恕，及將刑，人吏無遠近奔走，競解衣相率造功德，以為長史祈福，州人從之者十餘萬。

據《元和郡縣圖志》卷三一，開元中彭州全州人口只有五萬一百二十戶。「州人從之者十餘萬」即是每戶二人，一時怎能聚集起來？大集人眾的目的是什麼？如果有所動作又何必解衣祈福？記載顯有不合情理之處。按此事又見《大唐新語》卷五「孝行」，但文作：「百姓荷其仁恩，痛其誣枉，競解衣投於地曰：『為長史祈福。』有司平准，直十餘萬。」《太平御覽》卷四一四引《唐新語》亦同。知「十餘萬」是百姓所捐衣物折合的錢數，並不是州民人數。又如《舊唐書》卷九六《宋璟傳》載宋璟呼張易之為「張卿」事云：「當時朝列，皆以二張內寵，不名官，呼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天官侍郎鄭善果謂璟曰：『中丞奈何呼五郎為卿？』」《新唐書》卷一二四《宋璟傳》亦作鄭善果。《大唐新語》卷二作「天官侍郎鄭杲」。《資治通鑑》卷二〇七胡注引《考異》：「按善果乃是高祖時人，《新·舊傳》皆誤，當從《御史臺記》。」這說明《大唐新語》和《舊唐書·宋璟傳》都取材于《御史臺記》，可以用《新語》來糾正《舊唐書》的錯誤。

《新唐書》後出，列傳中直接採用筆記中的史料更多。岑仲勉《唐史餘瀝》卷四云，「據前人及余所考」，《新唐書》列傳採筆記有卷七七懿安郭太后事、卷一八二李珣事、卷一八三畢誠事採《東觀奏記》，卷八三和政公主事、卷一六九韋溫事採《因話錄》，卷一一六杜景佺事採《朝野僉載》，卷一二四姚崇事採《開元升平源》，卷一五

九崔雍事採《唐闕史》，卷二〇七魚朝恩事採《杜陽雜編》（《唐史餘藩》卷四）。但實際上遠不止此。如卷二二一王琚事採《開天傳信記》，卷一九二賈隱林事採《杜陽雜編》，卷一九九孔至事採《封氏聞見記》，卷二〇二王維、裴旻事採《國史補》，卷二〇五李畬母、符鳳妻、高叡妻事採《朝野僉載》，賈直言妻事採《獨異志》，殷保晦妻、李庭節妻事採《三水小牘》，等等。採擇過濫，又乏考證，故不能無誤，前人多有譏評。《直齋書錄解題》卷四曾批評《新唐書》「拾取小說私記，則皆附著無棄」，「徒繁無補」。王觀國《學林》卷五「霓裳羽衣曲」亦云：

李肇《國史補》曰：「客有以宴樂圖示王維，維曰：『此《霓裳》第三疊第一聲也。』客引工按曲，乃信。」今《新唐書·王維傳》亦載此事，蓋用《國史補》語也。觀國竊謂圖畫奏樂者，皆但能舉一聲，豈知其爲《霓裳》第三疊第一聲也？沈存中亦嘗辨之。蓋《國史補》雖唐人小說，然其記事多不實，修唐史者一概取而分綴入諸列傳，曾不核其是否，故舛誤類如此也。

當然，《新唐書》編者由於極力要避免和《舊唐書》重複，確有「若並此少數筆記而亦棄之，將至無從着筆」的苦衷（岑仲勉《唐史餘藩》卷四「總論新唐書」），但我們却不能因爲諒察編者的苦衷，而不去澄清其記載的謬誤。《新唐書》利用筆記形成的錯誤，有的源於原有筆記記載本身的錯誤，有的則源於原有筆記文字的傳訛。如《新唐書》卷七八《李漢傳》云：

始，漢爲中丞，表孔溫業爲御史。及漢晚見召，溫業已爲中丞，每燕集，人以爲榮。

謂孔溫業爲中丞時，李漢已歸朝，同宴集。但《李漢傳》前文交代云：「後（李）德裕復輔政，漢坐宗閔黨出爲汾州刺史，宗閔再逐，改州司馬。詔有司不二十年不得用。然不數歲，徙絳州刺史，遂不復振。大中時，召拜宗正少卿，卒。」《舊唐書·文宗紀下》：「（大和九年八月，李）宗閔黨楊虞卿、李漢、蕭澣皆再貶。」《全唐文》卷七五五杜牧《唐故歙州刺史邢君（羣）墓誌銘》：「今吏部侍郎孔溫業自中書舍人以重名爲御史中丞，牧以補闕爲賀客。」杜牧官左補闕時在開成四年（參見繆鉞《杜牧年譜》），而李漢大中時方召拜宗正少卿，與孔溫業爲御史中丞非一時之事。所以二人同在朝宴集的記載顯然不實。其實，這段文字本於《因話錄》卷三，原文是：

余座主隴西公爲臺丞，奏今孔尚書溫、丞相徐公爲監察。及孔爲中丞，隴西淹恤在外多年，除宗正少卿

歸朝，而孔、徐二公並時爲丞相，每讌集，時人以爲盛事。

《因話錄》本身有數處訛誤。第一，「孔尚書溫」下奪「業」字。第二，丞相徐公謂徐商，據《新唐書·宰相表下》，徐商咸通六年六月至十年六月爲相，而孔溫業僅官至尚書，未曾爲相。所以下文「並時爲丞相」當爲「並時爲丞郎」之誤。孔溫業大中四年官吏部侍郎，徐商大中五年官尚書左丞（見嚴耕望《唐僕尚丞郎表》），正與李漢除宗正少卿歸朝同時。第三，李漢大和九年貶出，開成四年孔溫業爲中丞時，李漢並未歸朝，不可能同時宴集。所以「及孔爲中丞」的「及」字當爲「後」字之殘訛，「丞」下當着一句號。文蓋謂李漢爲中丞時薦孔爲御史，後孔也官至中丞，說明李漢薦舉得人，並不是說孔爲中丞時李漢已歸朝。大約是宋代《因話錄》文本已有錯誤，《新唐書》編者未考察史實，駢筆直書，所以形成了新的錯誤。王讜《唐語林》卷四「企羨」亦錄此條，文作：「李某爲中丞，奏孔尚書溫、徐相商爲監察御史。孔爲中丞，李在外多年，除宗正少卿，歸而爲丞郎。每讌集，時人以爲盛事。」雖「丞相」作「丞郎」不誤，但同樣漏掉了孔溫業名中的「業」字，又因「孔爲中丞」和「爲丞郎」矛盾，遂將「爲丞郎」之事直接歸於李漢，錯訛更甚。又如《尚書故實》記載：

中書令河東公，開元中居相位。有張憬藏者，能言休咎。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公曰：「余見居台司，此何意也？」後數日，貶官台州刺史。

《新唐書》卷二〇四《方伎傳》據書云：「裴光庭當國，憬藏以紙大署『台』字投之。光庭曰：『吾既台司矣，尚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但兩《唐書·裴光庭傳》無貶台州事。《尚書故實》中的「中書令河東公」實指張嘉貞，其貶台州事見兩《唐書》本傳。《舊唐書·玄宗紀上》：「（開元十二年七月）戶部尚書、河東伯張嘉貞貶台州刺史。」《太平廣記》卷七七引《尚書故實》此條，於「河東公」下徑增「裴光庭」三字。《新唐書·方伎傳》蓋沿《廣記》妄增之文誤書。

筆記提供了研究唐五代作家作品的史料，一些二三流作家，他們的事蹟和作品往往要依靠筆記方得以流傳。如女作家魚玄機事蹟主要見於《三水小牘》卷下「魚玄機答斃綠翹致戮」條，晚唐詩人李山甫事蹟主要見於《太平廣記》卷二〇三引《耳目記》、《鑒誠錄》卷七及卷八、《北夢瑣言》卷一三、《賈氏談錄》諸書。《唐摭言》保

存了大量的詩文作品。《大唐新語》卷八「文章」中劉懷一與鄧茂林、呂太一與張法、賀遂亮與韓思彥的唱和詩，張宣明的《山行見孤松》和《使至三姓咽麵》，陸海的《題奉國寺》和《題龍門寺》，鄭蜀賓的《別親朋》，魏求己的《自御史左授山陽丞》，郭利貞的《上元》，就是他們僅存的詩歌作品；而張說對修文館學士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富嘉謨、閻朝隱以及後輩文人韓休、許景先、張九齡、王翰文章的評論，更是研究盛唐時期文學的重要史料。敦煌遺書中的《韓朋賦》、《燕子賦》等，被認為是俗賦的首次發現，提供了賦體文學在民間流傳的情況，填補了賦史的空白。但就在唐人段公路的《北戶錄》卷下「相思子蔓」崔龜圖注中竟保存了《韓朋賦》末段二百餘字，作為被傳世的古代文獻載錄的通俗文學作品，它既是我們研究《韓朋賦》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敦煌俗文學和敦煌文獻流傳情況的重要參照物，對於敦煌學研究具有特殊的意義。

唐代正史和文集中關於唐代婚俗的資料不多，筆記同樣可以彌補這方面的不足。《封氏聞見記》卷五「花燭」、《雲溪友議》卷中「吳門秀」、《酉陽雜俎》卷一「禮異」、《蘇氏演義》卷上等記敘唐人婚禮，有青廬、却扇、催妝等禮俗，認為是北朝的遺制。我們知道，我國古代最初只有女媧與伏羲為兄妹的傳說，漢應劭《風俗通》也僅說：「女媧，伏羲之妹，禱神祇，置婚姻，合夫婦也。」（轉引自《北山錄注解·天地始第一》），並沒有明確說他們二人結為夫婦。《全唐詩》卷三八八盧仝《與馬異結交詩》則說：「女媧本是伏羲婦。」大約因為此說大悖封建倫常，《路史》卷一一注斥其為妄，《全唐詩》也在「婦」字下校云：「一作『妹』。」但是，《獨異志》卷下有如下記載：

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女媧兄妹二人，在崑崙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與其妹上崑崙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為夫妻，而煙悉合。若不，使煙散。」於是煙即合，其妹即來就兄，乃結草為扇，以障其面。今時人取婦執扇，象其事也。

結合《全唐詩》卷八五張說《唐享太廟樂章·鈞天舞》中「合位媧后，同稱伏羲」的詩句來看（據《舊唐書·音樂志三》，這首樂章是為「高宗天皇大帝室奠獻」而作，媧后指武后，伏羲指唐高宗），說明伏羲、女媧結為夫婦的傳說在唐代宮廷和民間普遍流傳，並且深刻地滲入了當時的社會文化心理，表現在婚姻禮俗之中，盧仝詩中「婦」

字決不是「妹」字的錯字。這種情況的出現應當和李唐皇室既與胡族有着親密的血緣關係，王朝政權又承襲了北朝少數民族統治有關。因此，《獨異志》的記載不但是盧仝詩歌最好的注腳，也是研究古代社會、歷史、民俗和古代神話傳說及其變遷的極爲珍貴的史料。

一些筆記本身就是非常優秀的散文作品。例如：

大曆中，吳士姓顧，以畫山水歷抵諸侯之門。每畫，先帖絹數十幅於地，乃研墨汁及調諸采色各貯一器，使數十人吹角擊鼓，百人齊聲喊叫。顧子着錦襖，錦纏頭，飲酒半酣，繞絹帖走十餘市，取墨汁攤寫於絹上，次寫諸色，乃以長巾一，一頭覆於所寫之處，使人坐壓，已執巾角而曳之。回環既遍，然後以筆墨隨勢開決，爲峰巒島嶼之狀。夫畫者，澹雅之事，今顧子瞑目鼓噪，有□戰之象，其畫之妙者乎！（《封氏聞見記》

卷五「圖畫」

盧新州爲相，令李揆入蕃。對德宗曰：「臣不憚遠使，恐死道路，不達君命。」上惻然免之，謂盧相曰：「李揆莫老無？」杞曰：「和戎之使，須諳練朝廷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後差使小於揆年者，不敢辭遠使矣。」揆既至蕃，蕃長問：「唐家有一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個李揆爭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誣之也。揆門戶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致仕歸東都，大司徒杜公罷淮海入洛，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悴，看即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劉賓客嘉話錄》）

盧子嚴說，早年隨其懿親鄭常侍東之同遊宣州當塗隱居山巖，即陶貞白煉丹所也，爐跡猶在，後爲佛舍。有僧甚高潔，好事，因說其先師名彥範，姓劉，雖爲沙門，早究儒學，邑人呼爲「劉九經」。顏魯公、韓晉公、劉忠州、穆監寧、獨孤常州皆與之善，凡執經受業者數十人。年八十，猶精強，僧行不虧。性頗嗜酒，飲亦未嘗及亂。學徒有攜壺至者，欣然而受之。每進三數杯，則講說方銳。所居有小圃，自植茶，爲鹿所損，人勸以垣隔之，諸名士悉樂爲運石共成。穆兵部贊，事之最謹。嘗得美酒，密以小瓷壺置於懷中，累石之際，因白師曰：「有少好酒，和尚飲否？」彥範笑而傾飲滿，似酣，則語穆曰：「不用般石，且來聽書。」遂

與剖析微奧，至夕不倦。鄭君更徵其遺事，僧歎息久之，曰：「近日尊儒重道，都無前輩之風。」因出一紙穆兵部與書，敘寒暄之儀極卑敬，其略曰：「某偶忝名宦，皆因善誘。自居班列，終日塵屑。却思昔歲，臨清澗，蔭長松，接待座下，獲聞微言，未知何時復遂此事！遙瞻水中月，嶺上雲，但馳攀想而已。和尚薄於滋味，深於酒德，所食僅同嬰兒，所飲或如少壯，常恐尊體有所不安，中夜思之，實懷憂戀。」其誠切如此……

（《因話錄》卷四）

文筆省淨，描寫生動，顧況作畫的狂態，盧杞的奸佞狡詐，李揆的機敏豁達，僧人彥範的真率都呼之欲出。穆贇的書信也是一篇至情至性的好文字。唐代的官修史書越來越趨於程式化，本紀有同流水賬簿，列傳即是生平履歷，筆記這些鮮活的文字受到人們的喜愛，不脛而走，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對唐五代筆記的史料價值，人們認識的深化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北宋時期，宋祁修《新唐書》已經大量利用筆記中的史料。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曾在嚴格審查的基礎上對筆記史料加以利用，詳細情況記載在《資治通鑑考異》一書中。但大多數學者囿於筆記為「殘叢瑣語」的偏見，對筆記持輕鄙的態度。二十世紀初，張爾田作《玉谿生年譜會箋》，大量運用了筆記史料。王國維稱讚他能「旁搜遠紹，博采唐人文集、說部及金石文字，以正劉、宋二書之失」（《玉谿生年譜會箋序》），對「說部」即筆記的史料價值作了重新肯定。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引用《劇談錄》卷下「元相國謁李賀」條，指出：「《劇談錄》所紀多所疏誤，自不待論。但據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見當時社會重進士輕明經之情狀，故以通性之真實言之，仍不失為珍貴之社會史料也。」陳先生提出了「通性之真實」的概念，這纔從根本上全面地解決了筆記史料的價值問題。前輩學者高度重视筆記的史料價值，既嚴格審查，又靈活運用，這種態度和方法堪為我們學習的典範。

唐五代筆記在當時的文人中曾廣為流播，並被後來的筆記所借鑒或取資。如《北戶錄》引及《投荒雜錄》，而《北戶錄》又被稍後的《嶺表錄異》所引用。《因話錄》稱「近見房州李使君《資暇》」，《中朝故事》云「康駢著《劇談錄》」，《樂府雜錄》云「嘗見《教坊記》」，《金華子雜編》稱及《次柳氏舊聞》、《西陽雜俎》及《樂府新錄》

（即《樂府雜錄》），《北夢瑣言》所引有《北里志》、《國史補》、《三朝獻替錄》（當即《文武兩朝獻替記》）、《唐摭言》、《初舉子》、劉山甫《金溪閑談》（已佚）、佚名《北司治亂記》（已佚）、《刊誤》、《御史臺記》、《柳氏訓序》等十餘種筆記。范攄《雲溪友議》自序云：「近代何自然續《笑林》（已佚），劉夢得撰《嘉話錄》……」范攄大中時人，而《劉賓客嘉話錄》成書於大中十年（見該書韋絢序），二者幾乎同時，由此可見筆記流播的迅速和廣遠。

入宋以後，唐五代筆記出現了大量亡佚的情況。據統計，存留至今的僅五十種左右，不到四分之一。唐末五代的兵燹，人們對筆記的輕視，某些筆記本身質量的低下，都是造成筆記亡佚的原因。此外由於時世的移易，有的筆記不再有實用的價值，如盧光啓《初舉子》記唐代科場舉子考試時應注意的雜事，入宋後情況發生變化，此書遂被廢棄。有的筆記如韓琬《御史臺記》、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林恩《補國史》、韓偓《金鑾密記》等被《資治通鑑》大量採入，其內容得以保留，但原書失傳，原貌遂不可知。

太平興國年間成書的《太平廣記》五百卷，是一部巨型的古小說總集。它篇幅龐大，文字收錄相對完整，被譽為「小說家之淵海」（《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二），一直是人們輯錄和研究唐五代筆記的最重要的文獻。但限於體例，《廣記》對所收文字仍作了較多的刪節和改寫。刪節原文方面，一是刪去文中非敘事性文字，如《玉泉子》、《唐闕史》、《三水小牘》中凡有「玉泉子曰」、「參寥子曰」、「三水人曰」等議論性文字，大多被刪去。二是刪去文中注釋及《廣記》編者認為與事件關係不大的文字，如卷二四四「皇甫湜」條，刪去《闕史》原注四條共八十八字。又如《廣記》卷三四五「郭承嘏」條，《尚書故實》原書文末原有「余在京，曾侍太傅相國盧公宴語，親聞其事，今又得於張公，方審其異也云耳」三十字，交待材料來源，《廣記》未錄。對於筆記研究來說，這自然是一個重大的損失。在原文改寫方面，一是為了便於讀者理解，將繁複艱澀的文字改得較為簡約和通俗。高彥休《闕史》「敘事頗可觀，但過為緣飾，殊有銑溪蚘戶體」（《東觀餘論》卷下《跋高彥休闕史後》），《廣記》所引每加改易，如卷二四四「皇甫湜」條，改原書「刻珉之詞」為「碑」，改「黃絹立就」為「其文立就」；卷四九九「路羣盧弘正」條改「雖秦吳所尚而填簾其友」為「雖所好不同而相親至」，改「臘營一壺能同幕席天地否」為「家釀稍醇能一醉否」，均是。二是為了全書的統一，《廣記》往往改易人稱，將原書中第一人稱改為第三人稱，將文中人物官

爵謚號等稱謂改成人姓名，並且給每一條文字都加上一個題目。這樣固然方便了讀者，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誤改。如《廣記》卷一八六《嘉話錄》云：「劉禹錫云：『宣平鄭相之銓衡也，選人相賀得人其銓……』」加上了標題「鄭餘慶」。但據《因話錄》卷二，鄭餘慶與其宗叔鄭綱居長安昭國里，時人謂之「南鄭相」、「北鄭相」，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三昭國坊有鄭綱宅及鄭餘慶宅。餘慶當為「昭國鄭相」，「宣平鄭相」別是一人。德宗朝宰相尚有鄭珣瑜，字元伯，有子鄭覃、鄭朗，宋敏求《長安志》卷八謂宣平坊有「太子太師鄭朗宅」，《東觀奏記》卷下稱鄭朗「自中書歸宣平私第」，故「宣平鄭相」當指鄭珣瑜。《廣記》標題為誤加。《西陽雜俎》前集卷一九有「至德中馬僕射」的記載，《廣記》卷四〇九於「馬僕射」下增一「總」字。但據兩《唐書》本傳，馬總元和中官至僕射，與至德相去近六十年，且其歷官未至太原節度，《廣記》「總」字亦為誤增。宋人編錄唐五代筆記的著作還有《南部新書》等數種。其中《南部新書》篇幅窄仄，《唐語林》曾經散佚，《唐詩紀事》僅取詩人遺事，三書都很少注明出處；《類說》、《紺珠集》以書名立目，有類叢書，但錄書甚少完帙，文字又多刪節，《紺珠集》刪節尤甚，加之二書對筆記並沒有作必要的整理考訂，有條目錯亂、張冠李戴等現象。由於唐五代筆記已經大量亡佚，儘管宋人《太平廣記》等在編錄工作上存在一些問題，但其保存筆記史料之功仍不可沒。

元明清時期，少數唐五代筆記得以單獨刊行，大多數筆記被刻入叢書中傳播。自元陶宗儀《說郛》開始，明代的《顧氏文房小說》、《稗海》、《稗乘》、《寶顏堂秘笈》、《古今逸史》、《歷代小史》、《五朝小說》、清代的《唐人說薈》、《龍威秘書》等都收入了較多的唐五代筆記。其中《說郛》早出，所據為宋元舊本，文字較能存真，但此書體例未善，書籍編排及條目選錄都帶有極大的隨意性，有的筆記僅錄寥寥數則，難窺全貌。《顧氏文房小說》等則能擇取宋元舊本，精刻精校，頗存原書舊觀。但總的來說，刻入叢書的筆記都沒有經過認真的整理，而且書賈乘時射利，粗製濫造，其中摻雜了許多託名唐人的偽濫之書。阮元論及明代叢書時曾說：「當明天啓、崇禎間，吳中坊肆，賡續前人撰述，刊刻叢書，已成時尚。如宋左圭《百川學海》則有《續百川學海》之作，陶氏《說郛》則有《續說郛》，《顧氏文房小說》則有《廣四十家小說》。其他若《古今逸史》、《古今說海》等書，尤不勝縷舉。然率多陳陳相因，或即用其版，參互錯亂，更成一書；或用一書而分為數籍，更立名目。坊本《說郛》如周密所撰

諸書，即全由《武林舊事》割裂而成，非窺原書，無以知其僞也。」（《續修四庫全書提要》）清初陶珽重編的百二十卷本《說郛》，即大量增入明人所編筆記僞書。其中弓三三蘇特《衣冠盛事》一卷，乃取《國史補》及《唐語林·企羨》文字編成；弓三三陳京《葆光錄》一卷，乃取《國史補》十條及宋陳纂《葆光錄》六條拚湊而成；弓三四劉訥言《諧謔錄》文九則，分別見於《因話錄》、《北夢瑣言》、《國史補》、《盧氏雜說》、《大唐傳載》、《南楚新聞》諸書，非初唐人之作；弓四八馬總《大唐奇事》全取李隱《大唐奇事記》；弓一一七于逖《聞奇錄》一卷，三十條出《葆光錄》，五條見《三國志》、《搜神記》、《異苑》、《洞微志》諸書，惟「鄭昌圖」一條見《太平廣記》引佚名《聞奇錄》。它如唐朱揆《釵小志》稱「歐陽永叔在汝陰」、宇文氏《妝臺記》言及「宋淳化間」及「理宗朝」等，其爲明人僞作，一望可知。

清康熙年間，隨着學術空氣的日趨濃郁，刻書風氣開始轉移，乾嘉之後，較多的學者加入了筆記整理的行列。清代學者主持刊刻的《雅雨堂叢書》、《知不足齋叢書》、《守山閣叢書》、《粵雅堂叢書》、《雲自在龕叢書》等，其中所收唐五代筆記雖然不多，又偏於學術價值較高的筆記，但都能選擇善本，精心讎校，搜補遺佚，將筆記刊刻和整理結合起來。至於坊間所刻《唐人說薈》、《龍威秘書》等叢書，依然存在收錄僞濫、粗製濫造等弊病。

二十世紀以來，唐人筆記研究整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岑仲勉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大量引用筆記史料，並對它們作了嚴肅的考證，他的《跋封氏聞見記》、《跋唐摭言》、《唐唐臨冥報記之復原》等都是整理筆記的著名論文。趙貞信《封氏聞見記校證》、任半塘《教坊記箋訂》、唐蘭《劉賓客嘉話錄校輯與辨僞》（載《文史》第四輯）是筆記個案整理的優秀之作。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書》所收唐五代筆記大都經過學者名家認真細緻的整理。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周勳初《唐人筆記小說考索》對唐五代筆記作了全面的考察。周勳初《唐語林校證》、張國風《太平廣記版本考述》和有關《太平廣記》的一系列論文，對和唐五代筆記關係最爲密切的兩部典籍作了細密而深入的全面研究，爲唐五代筆記研究整理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但是，和唐五代的詩詞、散文、傳奇小說比較起來，筆記研究特別是筆記文獻的整理仍然相對滯後。一些筆

記沒有經過很好的整理，一些有較多佚文的筆記並沒有輯復，新出版的筆記仍然存在較多的條目錯亂重出、文字奪訛衍倒等情況，明人偽造的筆記也繼續出現在某些唐五代筆記叢書中，而編者對其真偽却不置一詞。

筆記文獻的混亂首先表現在偽文未辨方面。筆記中有着大量重出互見的條目。當然，和詩文創作不同，筆記不排斥直接編錄前人著述，但其中確有許多重出條目是流傳中的誤植，存在着真偽之辨的問題。如《稗海》本《玉泉子》全書八十二條，僅三十一條出自《玉泉子》，餘五十一條分別出自《因話錄》、《北夢瑣言》、《聞奇錄》、《逸史》、《集異記》、《芝田錄》、《閩川名士傳》、《錄異記》、《國史纂異》、《尚書故實》、《貞陵遺事》、《乾牒子》、《桂苑叢談》、《中朝故事》、《盧氏雜說》諸書，且全部條目均見於《太平廣記》，而《廣記》、《資治通鑑考異》、《永樂大典》、《說郛》等尚存佚文十餘則。說明《稗海》本《玉泉子》實際上是後人輯自《廣記》的質量很差的輯本。近年出版的叢刻本或單行排印本《玉泉子》以《稗海》本為底本，上述情況却沒有任何改變。

其次是佚文未輯或輯佚不全不真。有的筆記曾為前代典籍廣泛引用，如盧肇《逸史》、盧環《抒情集》、王仁裕《玉堂閒話》等，存有較多逸文，可供採集。有的筆記雖有較好輯本，但囿於當時的主客觀條件，今天看來，所輯並不完整，當予補輯。如《金華子雜編》，有清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本，後經周廣業校勘，並據《說郛》、《紺珠集》、《唐詩紀事》補文三則，刻入《讀書齋叢書》中。但原書尚可據《資治通鑑考異》、《唐語林》補七百餘字，《通鑑考異》、《春渚紀聞》、《天中記》另存佚文數則，而周氏據《唐詩紀事》所輯杜牧送孟遲詩，則為偽文，當刪。又如今人整理之《大唐新語》據《太平廣記》卷二六一補輯有「唐郎中李播典蘄州」一條。但李播，字子烈，曾為大理評事，開成中自郎中出為蘄州刺史，大和中，自比部郎中出為杭州刺史，見《劉賓客文集》卷二八《送蘄州李郎中赴任》、《白居易集》卷三四《送蘄春李十九使君赴郡》、《樊南文集補編》卷二《為汝南公與蘄州李郎中狀》、《樊川文集》卷一〇《杭州新造南亭子記》、《樊川外集·寄李播評事》等，故此條決非元和中成書的《大唐新語》之文。

第三是條目的混亂。筆記由一條條相對獨立的文字組成，一書之中很容易產生條目錯亂的情況，今存筆記有二條合為一條者，有一條而分為二條者。如《稗海》本《大唐新語》卷十二「勸勵」第五條云：「趙武蓋少